# 《故宫档案述要》简介

（日）神田信夫撰　成同社译

数年前，我曾以“清代史的研究和档案”为题草拟一篇文章，介绍了1980年前清朝档案的整理与出版情况。此后，对明清特别是清代档案的出版与研究大有进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千万余件档案，正在有步骤地进行整理。哈佛大学的库恩先生在1984年12月新出版的《清史问题》第五卷第二号中撰文介绍了该馆的出版计划。

1982年2月，该馆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历史档案专业季刊《历史档案》。该刊登载的各类历史档案都加注了标点。此外，关嘉禄、王佩环二先生将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文档案“黑图档”译成汉文，发表在新杂志《清史资料》第五辑。类似成果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台湾对清代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依持积极态度。张伟仁先生长期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清代法制档案，1983年9月出版了三卷《清代法制研究》。卷首载有27种档案的原色照片及附有详细注释的156种档案资料。毋庸赘言，目前台湾拥有大量清代档案的机构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原属1933年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献馆。据说南迁开始时，档案有3700余箱。现在，台湾仅有204箱。尽管如此，204箱档案中仍有大量各类重要档案，达40余万件。我曾见到高高堆积于该馆仓库中的档案木箱，为其数量之多而惊叹不已。

迁往台湾的故宫文物最初存放在台中市郊外的雾峰北沟。1965年，新馆在台北市郊外士林外双溪落成，故宫文物全部迁至新馆，直至今日。档案整理早在台中市时即已部分展开，正式整理始于迁至台北之后。

博物院新任院长蒋复璁先生就任于档案迁往台北新馆之时，他的努力是档案得以正式整理的重要原因。蒋先生本人也是研究人员，对为发展学术研究而公开宝贵学术资料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直至去年退休，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努力致力于文物的整理与公开。1968年，博物院新设图书文献处，下置图书馆与文献股。文献股专门负责档案。图书文献处长昌彼得先生及其它诸有关人士的非凡努力令人难忘。每当我走访博物院，见到一丝不苟、孜孜于档案整理的诸位先生，便不禁肃然起敬。

如今，数量庞大的档案已全部整理完毕，供其阅览。众所周知，宫中档最早得以整理，光绪及康熙、雍正年间的所有奏折已按年月日顺序影印出版，其规模长达67卷。乾隆年间的奏折影印件，目前，正陆续出版。此外，博物院出版了长达10卷的《旧满州档》。最近，又影印了长达百册的咸丰、同治年间的《清代起居注册》。以上作品部部可作为工具书。

关于宫中档，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分别按启奏人姓名、启奏年月日顺序、内容分类设三套索引卡片。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借出原档。至于军机处档，图书馆备有标注姓氏、年月日顺序的索引卡片。不过，该档纸质脆弱，所以，不提供原档，代之以复印件。如今，博物院阅览室天天挤满查阅上述档案的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文献处庄吉发先生的著作《故宫档案叙要》作为《故宫丛刊甲种》的分册问世，实在是一件合乎时宜，不胜喜庆之事。

## （一）

庄吉发先生一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整理档案。对待工作，他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博物院对清代档案的整理，不断进展。1969年12月出版季刊《故宫文献》，定期发表清史论文，并将雍正至康熙年间的奏折按启奏人分类，分别影印刊登。此外，自1971年6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三期起，作为专集，连载“本院典藏档案目录”，直至1972年6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三期。专集共连载五期，刊登了“本院典藏档目录”的1至5部分。其中，2至5部分署名“图书文献处文献股编。”档案目录分随手登记档、密记档、寄信档、外纪档、本纪档、月折档、上谕档、长编档，记录了该院现存档案的年度、册数。每项档案目录后的篇短说明都署名“庄吉发”。由此可见，庄先生直接参与了上叙档案的整理。

《故宫文献》也连续影印刊登了其它宫中档奏折，直至1972年12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尔后，故宫博物院又将全部奏折按年月日顺序影印，作为“特集”出版。为此，从1973年3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二期起，改为刊登同治朝军机处的月折档影印件。遗憾的是《故宫文献》仅连载该档四期即因经费原因停刊。不过，庄先生未停止工作，他更加努力致力于档案的整理与研究。

庄先生的部分研究成果作为论文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另一机关杂志《故宫季刊》发表，如《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代档案叙略》（《故宫季刊》第六卷第四期、1972年）、《清高宗乾隆朝军机处月折包的史料价值》（《故宫季刊》第十一卷第三期、1977年）、《清代上谕档的史料价值》（《故宫季刊》第十三卷第三期、1978）等等。庄先生的每篇论文都后附多幅精美附图。

1982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有六百余页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总目所及“文献档案”，昔日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管理。其中，除档案外，也包括实录等。台湾现存文献馆的文献档案204箱，详细分类如下：宫中档31箱、军机处档47箱、清史馆档61箱、起居注册50箱、本纪9箱、实录2箱、诏书1箱。图书与旧满州档1箱、杂项档2箱。《总目》将上叙文献档案分作五大类，官书、史馆档、军机处档、杂档、奏折。每大类下分各小类。如官书一项下分圣训、诏书、国书、奏议、实录、起居注册。《总目》收录的书物中有若干刻本、活字本，也偶尔有秀文斋刻本“满汉文四书六册”（584页）之类的满、汉两文书籍。不过，原则上，《总目》不收录满、蒙书籍。

《总目》共有618页。其中，“史馆档”部分462页，占《总目》四分之三。而且，其三分之二以上是录副撰稿人的姓名索引和按“录副折包笔划顺序排列的人名。为此，有关军机处档、杂档、奏折的说明一概极为简单，仅仅标明了现存奏折的日期。

庄先生在《故宫档案述要》的第一章诸论中指出，《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只是一份标出档案种类、日期及册数的草目。《总目》为学者参考所需而仓促出版，难免有疏漏之处。而且，《总目》未包括满、蒙、藏等边疆语言的档案，他日应以增补。

此次出版的《故宫档案叙要》与《总目》相得益彰。《故宫档案述要》对现存清代档案进行了分类介绍，说明了各类档案的来历、得失及各类档案的性质，对清史研究者查阅档案大有补益。

## （二）

《故宫档案叙要》是一部有550页的巨著。卷首的二张四页照片印刷纸印有奏折、实录、本纪、引见档、满汉文起居注册、国书、海战图的原色版照片。卷尾附48幅各类档案插图，约80页。正文占460页。

庄吉发先生非常勤奋，早已为人所知。听说他在工作之余，珍惜每一分钟时间，潜心研究清史。

确实，十五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论文，仅档案一项，有影响的著述就有《清代史料论述》一、二辑（文史出版社、1979、1980。第一辑包括《故宫季刊》中的三篇文章）、1977年出版的《清代奏折制度》（《故宫丛刊甲种》分册）。此外，还有一些单行本，如《清代准噶尔关系史料初编》（文史哲出版社、1977）（《初编》所录有关准噶尔关系的史料原为满文。还有，《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九辑收录的杭州织造孙文成的多达二百余件的满文奏折汉译文《孙文成奏折》（文史哲出版社、1978）等。庄先生出于工作研究档案自然应该。不过，他更把档案作为史料加以运用。他努力研究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作为《故宫丛刊甲种》的分册，1981年出版了单行本《清代天地会源流考》、1982年出版了《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此类论著数量可观。鉴于篇幅原因，不再一一例举。

如上所述，多年来庄先生始终利用大量档案从事清史研究，《故宫档案述要》集庄先生研究成果之大成。该书中的多幅附图曾见诸于已发表的论文、著作，有的文章已经发表，其中难免有重复之处。不过，从整体看，该书增添了大量内容，面目焕然一新。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不拘泥于一般地解说档案的来历、形式、性质，而是主要以庄先生本人多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具体举例说明如何运用档案解释历史事实。

该书共七章。第一章绪论简单介绍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的来历及整理过程。第七章结论有4页，是全书内容的总结。该书正文从第二章至第六章，凡五章。

第二章“宫中档的由来及其史料价值”由五节组成。第一节“宫中档的由来；”第二节“汉文奏折的史料价值；”第三节“雍正朱批谕旨的删改”；第四节“满文奏折的史料价值”；第五节“宫中档奏折的附件”。

如前所述，宫中档有相当数量已经影印，其内容也为人们熟知。其中，雍正朝档案中的《雍正朱批谕旨》影印发表后，受到宫崎市定、安部健夫等先生的注意。他们多方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佐伯富和杨启樵两先生也针对《雍正朱批谕旨》的删改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

庄先生关于宫中档满文奏折史料价值的论述新颖别致。庄先生一一例举康熙朝费扬古关于准噶尔关系的奏折、觉罗满保关于台湾朱一贵之乱的奏折、孙成文关于农作物时价的奏折以及雍正年间的八旗问题等，论述满文奏折的重要性。庄先生精通满文，满文档案也确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宫中档除奏折外还包括各种簿册、谕旨及附图。尤其用于《故宫档案述要》封面的雍正五年私历和卷尾附图中的蝗图极为罕见。关于这两幅图，书中附有说明。至于蝗图，庄先生已在“清代宫中档的史料价值”（《清代史料论述》二）一文中加以介绍，并作为插图附在文中。蝗图似乎取自山东巡抚陈世倌雍正二年八月七日的奏折。影印本大概略去了蝗图，奏

折引用文后的注（注释号162可能是163之误，论文漏掉162号）道："宫中档、第75箱、468包、16212号、陈世倌，雍正二年八月初七奏折。"其实，本章注释即注明了原档的箱、包号和登记号，也指明了引文出自影印本《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的第几辑、第几页。陈世倌情况特殊，姑且不论。然而，其它内容只需注明影印本的辑号、页数，读者即可明白出处。可不知本书为什么又注出登记号等。想来，作者看到鄂尔泰的大部分奏折都注有登记号，便照搬利用上述方法注释的已发表的"从鄂尔泰已录奏折谈《朱批谕旨》的删改"（见《清代史料论述》一）一文。

第三章和第四章论述清朝后期最高政治机关军机处的案档。

第三章"军机处月折包的由来及其史料价值"由四节构成。第一节"军机处的设置经过；"第二节"录付奏折与月折包的由来；"第三节"月折包的文书种类；"第四节"录付奏折及其附件的史料价值。"

第四章"军机处档册的种类及其史料价值，"共六节。第一节"目录类档册；"第二节"谕旨类档册；"第三节"专案类档册；"第四节"奏事类档册；"第五节"记事类档册；"第六节"文移电报类档册"。

三、四两章共174页，约占全书的四成，可以说是本书重点。如前所述，军机处档案仅有极少的一部分被影印刊载在《故宫文献》上。人们希望详细了解这18万件数量庞大的档案的具体内容。第四节为满足读者要求，围绕军机处档案的种类、形式、现存状况等一般问题及各类档案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具体阐述了这些档案的史料价值。

如目录所示，第三章是对军机处月折包的说明。军机处每半月或一月便将抄录的奏折付本归为一包保存。月折包由此得名。宫中档中的朱批奏折并未全部得以保存，月折包可大大加以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月折包还保存有未经朱批的部院衙门的奏折原本及咨文、火票、札文、呈文、书信、照会、国书、檄谕、条约、章程、清单、舆图等等。

第四章主要介绍军机处的档册。军机处的档册，种类繁多。如各节标题所示，庄先生将其分为六类。具体说，目录类包括随手登记档、交发档等。谕旨类包括上谕档、廷寄档，专案类包括安南档、东案(乾隆三十九年王伦之乱)档等。奏事类包括议覆档、月折档等。记事类包括引见档、密记档等。文移电报类包括平定准噶尔文移档、电寄档等等。上述档案均由军机处保存，或分类抄录全文或摘其要点。其史料价值之大无需在此赘言。

第五章"本阁部院的设置及其现存史料"，共五节。第一节"内阁承宣的文书"，论述诏书、敕书、诰命等。目前保存最多的是诏书。该节例举了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篇诏书"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将其与乾隆重修的《清世祖实录》作认真地字句比较，证明《实录》如何进行了润饰删改(293—296页)。文章丝毫未提及康熙初纂的被称作"清三朝实录"的《清世祖实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康熙初纂的《清世祖实录》的行文更近于诏书。

此外，"内阁大堂在太和门内"（292页)大概是"太和门外"之误。

第二节"帝王言行与国家庶政的当时记录。"该节主要解释起居注册，举例说明康熙朝满文本的特殊意义。

第三节"宫修书籍及其文件。"该节主要解释实录。文中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顺治朝纂修的汉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的实录。此外，文章也例举了三田村泰助、松村润及笔者的论文，用以强调上述实录的价值。文章也简单介绍了"圣训"、"大清会典"、"户口清册"等。

第四节“内阁日行公事的档册”。该节简单记述了内阁、部院记录的丝纶簿、上谕簿及题奏档、奏事档、军机档等。上述簿、档的现有数量似乎极少。

第五节“旧满州档的由来及其史料价值”。该节主要解释《旧满州档》。《旧满州档》一书由该院1969年影印出版的十册单行本组成，作为入关前的满文史料颇有影响。我曾在其它文章中作过介绍，在此恕不赘述。庄先生参考《旧满州档》卷首登载的陈捷先先生的“旧满州档述略”和广禄、李学智两先生的“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四期），概括介绍了《旧满州档》。不过，对《旧满州档》的正式研究，是今后的课题。

第六章“史馆的设置及现存史料”。该章介绍了清朝国史馆及其以后的中华民国清史馆收藏的档案。国史馆收藏的档案已于当时大致编纂成本纪、表、志、列传。清史馆是为编纂纪传体的正史“清史”而设置的机构。不过，清史终未完成。1928年，出版了未经定稿的《清史稿》。

第一节“国史馆及清史馆的设置。”该节简单介绍了两馆的由来。

第二节“满汉文本纪的纂修。”该节简单介绍了国史馆完成的满汉文本纪和«清史稿»的本纪稿本。关于满文本纪，陈捷先先生著有专著《满文清本纪研究》（明文书局、1982）。庄先生在«故宫档案述要»中提到“十二朝东华录据实录修成”（388页）。所谓“十二朝东华录”是台湾出版社近年在“十一朝东华录”后添加朱寿朋所纂《光绪东华录》而出版的一本新书。«光绪东华录»的成书早于光绪帝《清德宗实录》。上述话题与本文无特别关系，为慎重起见，特作简单说明。

第三节“现存的各种志书”。

第四节“国史馆及清史馆的年表”和第五节“现存列传的付稿与付包”介绍了两馆编纂的各种志、表、列传及长编。上述稿本多种多样，难以详加介绍。

从上介绍了《故宫档案述要》的概况。通过该书我们清楚了解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40余万件档案。当然，庄吉发等先生在此之前已曾对上述档案部分进行了介绍。不过，该书才使我们首次得以综观40余万件档案的全貌。该书给予研究人员的方便将难以计算。在此，再次向为撰写本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庄先生表示敬意。

## （三）

本刊编委会希望我简单介绍最近出版的庄吉发先生校注的《满汉异域录校注》与《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第一辑》。前者于1983年8月，后者于1984年10月，分别由台北的文史出版社出版。

毋庸赘言，《异域录》是图理琛于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间，出使移居苏俄境内里海北岸的土尔扈特部落时撰写的见闻录。此书有满、汉两种文本，均为珍本。众所周知，近年来倾心研究该书的学者是已故的今西春秋先生。1964年，天理大学出版了他的大作《校注异域录》。今西先生在该书中将满文以罗马字音译，作为“日满对译异域录”，逐字逐句加以翻译，并作详细注释。此外，该书还收录了新汉译本《汉译满文异域录》和北京大学收藏的满文本及全本汉文异域录的影印本。

庄先生的校注本，每页上端是影印的满文部分，中间是满文的罗马字音译，下端是加注

了标点符号的与满文对应的汉文部分。该校注本作为教材使用的确方便。该书末尾的注释仅有7页，而且，大部分注释文字的异同，与今西先生的注释相比远为简单。庄先生的校注本名为《满汉异域录校注》，却不知为什么缺少有关满文本的校注。

庄先生在序中写道，近世来，异域录颇引起西方学者的瞩目。先后有法译本、德译本、俄译本、英译本。今西春秋先生1964年出版的《校注异域录》的底本是九耐堂满文本与桂岩汉文全本。满文本《异域录》，文字优美流畅，不仅是极为罕见的历史文献，也是珍贵的语文资料，确宜广为流传，适于满文初学者阅读。为此，本书将影印九耐堂满文本，逐页加注罗马字拼音，并附桂岩本汉文本，以便满汉对照。通过这段序言不难看出庄先生的《满汉异域录校注》处处依据今西先生的校注本。然而除序言外，书中再无半句解释注文出处及对今西先先表示谢意。对此甚难理解，深为庄先生的名誉婉惜。

顺便介绍桂岩本。桂岩本是今西先生首次加以介绍的汉文本《异域录》。今西先生指出（《校注异域录》题解、14页），桂岩本卷首的石文焯序、自序及卷尾缺少的数千字是根据桂岩老樵的藏本而补足，桂岩本现藏于北京大学。今西先生在"全本汉文异域录"的前言中提到，汉文影印本的底本是京都大学收藏的初刊本，其残缺部分参考东洋文库收藏的再刊本和桂岩本补足。其实，东洋文库收藏的版本是全本。今西先生根据桂岩本补足的石文焯序、自序及卷尾的残缺部分该版本丝毫不缺少，因此，今西先生毫无必要依凭桂岩本。可是，20年后，庄吉发先生又重蹈复辙。

最后，介绍《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各朝宫中档奏折中，汉文奏折的数量自然占绝对优势。不过，也有满文奏折及满汉合璧奏折。所谓合璧是指在同一页中，右用汉文，左用满文书写同一内容。近年来，满文档案陆续被发现，受到人们重视。其中，乾隆与康熙、雍正朝的满文奏折的重要性重被人们认识。

最近出版的《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第一辑》收录了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帝初即位时的1份满汉合璧奏折及雍正元年二月至九月间的44份奏折。该书每页上端是满文奏折的影印件，中间是罗马字音译，下端是加注了标点符号的与上端满文对应的汉文。这与前面提到的《满汉异域录校注》相同。只是以罗马字音译满文朱批时，将满文朱批括入括孤，〔〕内是庄先生翻译的汉译文。正如庄先生在序中提到的那样，康熙帝、雍正帝可以自如运用满汉两种文字，一版用满文朱批满文奏折，用汉文朱批汉文奏折。对满汉合璧的奏折，两帝常以满文朱批满文部分。此外，有的朱批虽有满、汉两种文字，但其内容未必一致。庄先生的著作大概以满文为主，正文省略了汉文朱批。

我本人1984年度研究生院实习时，读了几份雍正年间的满汉合璧奏折，做了详细比较。我深感，以满、汉两种文字撰写朱批，可以有效地帮助下属准确理解奏折正文，决不能认为满文只是汉文的转译，有汉文足矣。庄先生在本书卷尾的注释中一一指出了满汉两种，朱批的不同。今天研究清史，不论是研究入关前还是入关后都需要满文知识。

此外，本书收录的满汉合璧奏折也收录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的第1辑与28辑中。本书目录记录的各档名称与《雍正朝奏折》目录中的名称大不相同。将档案名称统一为11字固然巧妙，但采用原文名称可以避免混乱。此外，最好注明原文所载页数。《雍正朝奏折》将满汉合璧的奏折一分为二，分别立册。本书则坚持满汉合璧，以罗马字音译满文，指明满、汉文的不同，对读者甚为方便。第1辑后，可望陆续出版续集，祝成功。

**（译自《东洋史研究》1985年第2期）**